

辛亥革命在萨拉齐一带

史 银 堂

在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前后，一些宣传民主主义的书籍陆续传入土默特右旗，当地不少进步青年受到了革命思潮的影响。

1907年，同盟会山西支部负责人续桐溪派遣会员王建屏（忻州人）和弓富魁（原平人）潜入萨拉齐。王建屏在耶稣堂当了教书先生，弓富魁做了行商。他们利用合法身份相机鼓吹革命，广泛结交社会各界人士，秘密发展同盟会员。在萨拉齐一带，先后发展蒙古族青年云亨、经权、安祥、满泰、汉民王瑚、游梦周、牛青山、王三元、李雨山，回民马善先、马子衡等人加入了同盟会。这些人带头剃掉辫子，积极宣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反对缠足、留辫子等革命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一定的共鸣，但也引起了上层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注意和仇视。土默特右旗的才二参领曾大骂革命党是“邪教”，革命党人是“大逆不道的叛国之徒”，萨拉齐耶稣堂的瑞典传教士发现了王建屏的一封密信后，便很不客气地将王建屏从教堂中撵了出来。

1911年9月，同盟会派遣正在北京暨边学校读书的云亨回家乡策划起义。他在土默特旗启运书院召开了讲演会，宣传革命道理，在萨拉齐、包头一带秘密奔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据王佐卿回忆，云亨有一次曾气愤地说：“英国才有三个海岛，那么小，就那么强，我们中国幅员几千里，

这么大，就这么弱，真是可耻！这不统一不团结就是大问题”（内蒙古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所藏、王佐卿：《关于我所知道的经权和云亨的言行点滴》）。

同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消息传来，萨拉齐一带满城风雨。经权、满泰、武海及云亨的父亲云二仓、安祥的父亲克仁额等，由于同盟会的关系，担任了萨拉齐厅咨议局的咨议员。10月19日，驻归化城小教场的外八旗巡防营发动起义，由大青山后绕道进至包头附近。当时萨拉齐、包头的一些同盟会员计划以这支武装力量作支柱，并幻想与驻包头的五原厅同知樊恩庆等联合扩展革命势力，但老奸巨滑的樊恩庆以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包头公行马号的大厅里设下陷阱，于11月5日将起义部队首领和一些同盟会骨干枪杀。云亨、巴文峒在回民队长马善元的帮助下，越墙而逃，幸免于难。

10月19日，山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成立山西军政府，举同盟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为都督。农历十一月，阎锡山率部北上，经晋西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踏冰渡过黄河，于二十五日攻占了包头，并欲乘势东进。当时萨拉齐厅按照清制只驻绿营兵40名，民练20名，无实力可言，加之前段同盟会的宣传鼓动，当时人心倾向共和。为此，咨议局开会议定，选派云亨、经权为代表，星夜奔赴包头，欢迎阎锡山率部东进驻萨。阎锡山即派云亨返回萨拉齐，接应革命军的行动。

这时，清朝绥远城将军坤岫得知阎锡山率革命军攻占了包头并要继续东进的消息，立即调遣巡防统领谭永发，带领近二百名营兵赶赴萨拉齐，防止革命军东进。谭永发率部于三十日晚抵萨拉齐，会同萨厅知事呼延赓，将旧有的抬枪、

土炮运到西城门城头，胁迫城内乡勇构筑工事，关闭城门，严密布防。正在萨拉齐城内工作的同盟会员满泰侦知此情后，星夜缒城而出，给革命军报告了消息。

农历十一月二十七日，阎锡山都督命令统带王家矩率步队两营、马队1营、重炮队1队、游击队1队，从包头出发东进，行至鄂尔圪逊宿营。二十八日晨，队伍从鄂尔圪逊东行数里，与清军遭遇。上午4时开战，打至下午6时，清军力渐不支，向东败退，退到萨拉齐，紧闭城门固守。王家矩、张培梅追至城下谩骂叫阵，想激怒对方出战。但清兵气馁，终未敢战。革命军退驻萨拉齐城西1里许的吴坝村。二十九日黎明，风雪交加，革命军乘势发起进攻，炮队猛轰萨拉齐西城门。谭统领闻报立即登城指挥抗拒。双方战斗了一天。正在战争十分紧张的时候，谭统领的部下曾军佐忽然跑来哭着报告军情，谭统领怀疑曾军佐密通革命军，示意亲随将曾击毙于城下。经此变故，谭统领感到内患将及，想临阵逃脱。便一面鼓励守城兵民继续固守，一面托言亲往东门调军佐李得功前来助战，单骑而去。移时革命军用大炮猛轰城墙，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守城兵勇招架不住，纷纷败退而逃。随之城门被打开，革命军涌入萨拉齐。

革命军进城后纪律严明，人民群众欢呼庆祝。十二月初三，阎锡山率部从包头抵达萨拉齐，指挥部驻扎在大西街的德全店（现邮局家属院内）。阎锡山为了扩军，派人将萨拉齐监狱的囚犯释放，并让囚犯中身体魁梧，行侠尚义的张万顺（外号胖挠子）组织愿意从军的囚犯和经权早已联络好的地方武装共五百人编成了敢死队。任命经权为管带，胖挠子为队长。接着阎锡山派王家矩到水涧沟门把正在组织群众的

云享请到萨拉齐，共商进兵归化的大事。同时，阎锡山派亲信张树帜向当地十多家殷实商号募捐，每家捐白银两三千两不等。

阎锡山率领的革命军在萨拉齐停留五天，于腊月初八开拔东进。出发前责成同盟会员王瑚、游梦周、王三元、马嘉勋、马岐山等人处理善后事宜，任命统带王家矩为前敌总指挥。当革命军行到萨拉齐东约七十里的陶思浩村时，由同盟会中央领导人黄兴签署的任命云享为绥远城将军，经权为归化城都统，安祥为归绥道道尹的命令发布，在萨拉齐刻好印鉴后，由云二仓赶到陶思浩交予他们。

在此前一天，清朝绥远城将军坤岫急令发义、福坦率领土默特旗蒙古军步兵第二营和骑兵营共795人赶至刀什儿村，阻击革命军东进。为此，云享、经权给发义、福坦发出专函劝其起义，但这些人没有看清满清王朝即将灭亡的趋势，仍坚持顽固立场，拒绝了云享、经权的劝告。革命军看到采取和平方式不行，就决定用武力征服。

初九拂晓，寒风凛冽，冷人逼人，王家矩指挥革命军向刀什儿村发起攻击，直扑土默特旗步兵二营的防地。土默特旗步兵二营沿村西南边布防，依靠场面用石头垒成的矮墙作掩体，仓促应战。日间，革命军几次波浪式冲锋均被土默特旗步兵二营依靠有利地形击退。双方激战终日，坚持不下，革命军伤亡数百人，土默特旗步兵二营伤亡二人。黄昏时，王家矩下令：“攻下归化城大抢三日！”并与经权、张万顺带领的敢死队不避弹雨，拼命冲杀。蒙古军眼看支持不住。这时发义望见革命军中有一位军官骑着黑缎似的骏马手执红旗，奋勇冲杀，左冲右突，指挥甚力。发义急中生智，当即

挑选12名优秀射手，一齐朝这个指挥官射击。可巧，其中一个曾是当地优秀猎手的子弹击中了这个指挥官的头部，当即殒命落马。此人正是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王家矩。这时发义趁势指挥蒙古军出击，喊杀声喧嚣。革命军看到王家矩被击杀，纷纷败退下来。

阎锡山看到一个小小的刀什尔战斗就损兵折将，估计攻夺归绥更为困难，又恰在此时，传来了南北议和的消息。他担心在此久留，被别人抢了太原，于是就此停止东进，率领原革命军及在萨拉齐新编的敢死队和云享、经权等同盟会员经善岱、托城、河口渡过黄河，回了山西。

革命军转进之后，土默特旗的蒙古军开进了萨拉齐，在厅署的西辕门外杀害了咨议局文牒王鸣文。

不久，满清宣统皇帝退位，国体变更，共和成立。1912年，废帝号改为民国元年，萨拉齐废厅改县，成立萨拉齐县政府，首任县知事李景泉。1913年由王建屏接任县知事，王在任期兴办学校，周济穷人，秉公办案，剿除匪患，办了不少好事。

王建屏，字子衡，山西文水人，早年参加革命，曾任山西都督府参议，后任萨拉齐县知事。他在任期间，正值辛亥革命成功，全国上下洋溢着共和的气氛。王建屏作为一位开明的士绅，积极拥护共和，致力于地方建设。他兴办学校，不仅为当地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也促进了当地文化事业的发展。周济穷人，体现了他乐善好施、体恤民情的品质。秉公办案，则显示了他公正无私、廉洁奉公的作风。剿除匪患，更是他保境安民、维护地方稳定的重要举措。这些事迹无不彰显了他作为一位优秀地方官的担当和作为。

辛亥革命老人王建屏在萨轶事

刘 绍 仁

一九〇七年由同盟会山西支部派来绥远地区的会员王建屏，在萨拉齐一带进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活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成功，清帝退位，改纪民国，确定一九一二年为民国元年。萨拉齐改厅为县，首任县知事为李井泉，一九一三年王建屏接任萨拉齐县知事。

一、一件凶杀案

一九一五年初夏的某日上午，有城南发彦申村的一个年轻妇女菅存芳，到萨拉齐县衙门击鼓鸣冤。当时的妇女大都缠足，一个缠足的年轻妇女夜间由遥遥数十里地的发彦申步行到萨拉齐为她的丈夫鸣冤，一时轰动了萨拉齐县城，人们纷纷议论称奇。

县知事王建屏是参加推翻满清活动的革命党人，有救生灵于涂炭的责任。他一闻鼓声当即传唤当值一应衙役等人立即升堂，令带诉状人上堂，王问她的姓名住处，有何冤情，菅存芳诉述她的丈夫约在半夜被张全越墙推开窗户，跨入屋中用镰刀砍入丈夫肚中致死，尸体和凶器未敢打动，请求县长为民妇伸冤等情，王听她诉述后，便问菅诉张全为杀人凶手有何情由证据？菅存芳说：“张全在村里一贯欺压良善称霸一方，他认为我家破了他的婚事，所以杀害我丈夫是蓄谋已久的。在饮牲畜的井上就曾对我丈夫进行过恶毒的谩骂、

殴打，后来经村里人多方劝阻才未造成大的事端，我也为平安了事劝慰自己丈夫，凡事要来回的想，咱们让着点，免得闹事，可是张全并没有打消对我家行凶的主意，就发生了杀死我男人的事件，请求县长做主，快快捉拿凶犯张全为我伸冤”。

二、验尸捕嫌审讯

王建屏知事初步了解并受理此案后，立即命令县衙中的班头、捕役、仵作人等到出事地点查勘现场，检验尸体，并嘱咐先头出发的人员，为防止凶犯畏罪潜逃应严密监视。

王知县到达发彦申村后，菅存芳立即从村公所里提出了铜锣，边敲锣边吆喝：“大小住户，男女老少，王县长现来检尸，成年男人都要去现场，谁要不去谁就是凶手。这样一传锣，村民怕连累自身陆续到场。那个张某比任何人都到的早，衣服穿的更为整洁，并出场维持秩序，也象是安善良民。

验尸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死者肚腹砍入镰刀一把，刀伤腹腔数寸深，伤及内脏，由于出血过多死亡。在现场菅存芳要求立即逮捕张全。王知县遂令暂将张全逮捕回县。

张全被捕入狱，经多次审讯，他只是满口呼冤叫屈，矢口否认有凶杀行为。虽经用刑若干次，也得不到任何犯罪供词，王知县经过反复思考，过分用刑，难免屈打成招，冤枉好人，更不能偏听原告一面之词，作为定案依据。遂宣告暂缓审理，另行定夺。而菅存芳不时到县衙催问，她觉察到王知县有缓办此案的意思。当王知县再次审理，对原告进行劝供，意图一俟证据确凿再依法判决时，菅存芳将事先藏在身

上的一把尖刀抽出，即在大堂自杀，经两边衙役抢救，才未造成事故，王知县对原告说了些劝慰的话，并表示一定要将案件搞个水落石出。按法处理。

三、知县王建屏下乡私访

原告不时催问，被告却顽抗不供，王建屏知县为了早日了结此案，决定下乡私访。王知县备了一副筐箩扁担，装作小贩，担上筐箩，从沟门村贩了一担黄杏，径直到发彦申村叫卖黄杏。人们一听是一个地道的忻州买卖人，边卖杏边和群众拉呱。卖完杏便住在发彦申村打短工耨苗锄地。自古道：“锄田汉，瞎捣乱”，他们是天南地北，张家长，李家短，无所不谈，尤其是对本村的新鲜事更是谈得起劲，人们说张全这次被抓是罪有应得，杀人者应该偿命等。田头地边的谈话已经证实张全在村里强梁霸道行为，张口骂人，动辄打人有行凶可能。

原来有人给张全做媒说的邻村一个闺女，女方父亲出外询问男方的为人等，一次问到被害人的父亲，他竟如此这般将张的情况全盘托出，张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一天正巧王知县被张家雇去锄地，闲聊中谈起这一问题，他父母以为这是一个外路受苦人，闲扯两句也没关系，说他的儿子一贯为非作歹，我们虽然多次管教也无济于事，现在犯法是自做自受。称硬骨头，不行！“人心似铁，官法如炉”。群众议论纷纷都认为张全是杀人犯。

王知县在发彦申锄了十多天地，情况基本掌握，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为了准确无误了结此案，回到县衙，传唤他的父母，问及他儿子为甚要在发事之日换衣服，并让将原先

所穿旧衣服拿来验证。原来夜间所洗血污的衣服仍留有痕迹。张犯父母明知他的儿子一向胡作非为，早已声言要杀害营的男人。便如实供述了张犯在行凶下午磨着家中镰刀等情并正式出具甘结。

四、处决杀人凶犯

在多方取得证据下，并经家人证实，以及血衣，凶器镰刀等均查证为他家之物，遂判张全死刑，报请上级批准原判，按期处决。

王建屏知县，生长在没落的清王朝，他深知农民的甘苦，对地方强暴、称霸一方的刁民更是深恶痛绝，所以他为除暴安良煞费苦心，确是一位好官。

于科长—于源的抗日活动

董全仁 董全威 董耆保

陈顺 口述 董文华 执笔

1937年深秋，从东来的日寇，在沙图沟及邻村进行骚扰，老百姓惶恐万状。连老婆老汉都爬上了村后大青山。沙图沟村南仅一里远的高家脑包，有一次日军驻下丢了一支手枪，把26名青壮年逼在一个场院里，用火烧子弹，杀人为戏。结果一股黄风把鬼子熏走，26名无辜的人幸免于难。

整整过了一年，形势在开始变化。也是深秋时节，人们身穿夹衣，身上还有些凉飕飕的。一天，黄昏时分，一队身穿夹衣，脚穿麻草鞋的兵进了沙图沟村的后街。街中心有一座古庙，古庙前有一棵老榆树。这些兵听从指挥，就在庙院里榆树下席地而坐。

他们带的武器，有长枪，有短枪，短枪可能是当官的。他们都穿着一身黄绿色的军衣，肩上挂有干粮袋，背包就是被褥。

村里的会首早已通知邻近的各花户为当兵的做小米饭。时间不长，老乡把小米捞饭和咸菜端给他们吃。带手枪的感谢说：“你们还不够吃，能给我们端这么多”。

晚上，后街二十多户人家里全住满了当兵的。他们进院回家，一不伤害鸡猪，二不打骂穷人，开口叫老乡。房东看他们太疲劳了，也不打扰他们，心想让这些人多住几天。

哪料到，许多青年娃娃早上起来一看，那些当兵的早就走了。他们望着部队留下的脚印，久久不想回家。当时老年人说这就是红军。有知识的人说，红军是红军，是改编了八路军的红军，是李井泉支队头一次下山开辟根据地。

八路军走后不久，沙图沟村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此人个头不高，干瘦干瘦的，白嫩脸，粗眉毛，眉毛下架着一副眼镜，别看个头不高，可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越走越快，最快的速度，一个尿气的马都追不上。

经村里张老猫自卫团的人一介绍，人们才知道他叫于科长。他住在董全仁的大爷家的小南房里。自卫团派队员贾顺等人经常给他带来小米子、油、盐等吃的。有一个阶段，村里有一个十四五岁的穷孩子董耆保还为他照门。

时间长了，村里的青壮年都知道他是为八路军办事的。不仅明场上不暴露他，而且还暗地里保护他，亲如一家。

于科长所依靠的张老猫自卫团万无一失，他的上级深知张老猫不会把真情报告给日本鬼子。张老猫素来受八路军爱国抗日的精神所感化，所以在八路军这方面没有办过亏心事。

于科长在沙图沟、美岱召、美岱桥等村活动，穿的是平常便服，上萨拉齐、包头，他就穿上肩上有明显的自卫团符号的服装，谁也不敢怀疑他是八路军。上萨拉齐，他不是坐火车，就是步行。沙图沟到萨拉齐四十多里，于科长以最快的速度，夏季半天可往返一回。他到萨拉齐买宣传用品，晚上回来，或带油印机，或带一沓沓白色纸、红色纸，印刷传单。他常常工作到深夜。写文件，好象蛇在纸上窜，一会儿用左手写一张，一会儿用右手写一张，写好后，两张纸对

在一块，仔细端详，然后各叠成三角形，拧成四方棱块传送出去。夜太深了，他就和衣而睡，很少脱衣服睡觉。外边有动静，就提上手枪出门探视。于科长随身带着一个煤油炉子，自己动手做饭，小米粥是他的家常饭，同村里的人一样的吃法，一顿只吃一碗饭。

在沙图沟，于科长呆了半年多。这半年多中，他常常来美岱召村赵明亮自卫队部，因赵是张老猫的下级，所以于科长出进方便。离赵明亮部不远的一家叫牛来发。牛来发家贫、善良、好客，很快就结识了于科长。

到牛来发家，于科长的眼镜支架断了，用拧成的几根线挂在耳朵上。从外表看不显眼，很少有人在他身上打主意。有一次，于科长请牛来发带路进美岱沟。牛二话没说，就引着他进了沟。进沟后牛问他从哪个方向走，他说我知道就不麻烦你了！凭牛来发的判断，于科长隔一个阶段就要上后山汇报一次，后山有李井泉司令员的司令部，于的根子就在李所在的根据地。

于科长动员宣传，争取了好多有识之士。在沙图沟，他认识了当时给张老猫团部喂马的陈顺。他对陈顺说：“中国有灭亡的危险呀，但看我们敢不敢起来斗争，如果不敢，我们就要当亡国奴；如果团结起来斗，我们就能胜利，能解救穷苦人”。陈顺受了他的爱国主义教育，立志参加革命，第二年就当了解放队的交通员。

在美岱召，于科长还结识了赵明亮部的文书王经雨。与王经雨多次交往，把革命道理讲给他听，使这个已经接受了革命道理的人思想觉悟有了更多的提高。他联络美岱桥张恒山，张曾为他散发过传单。

在与沙图沟的青年人接触时，于经常讲抗日的道理动员他们当兵，青年人都很爱护他。日本鬼子虽然经常进村搜查，但就是见不到于科长。

于科长在沙图沟住下以后，村里经常有三四个、四五个手枪队从山上下来，这里面被人们认识的有雷子和、卢指导员，他们都是武工队队员，他们一来，如果是于科长在，总要碰头会面，研究抗日的事情。

陈顺老同志说这位于科长叫于源，是大青山支队敌工科科长，做敌人后方的工作。于源1939年在东进途中光荣牺牲。年龄约三十岁。

于科长是大青山南麓、黄河之滨第一个做地下工作的同志。

于科长文化程度高，相当一个大学生，有武功，晚上从包头回来，神不知鬼不觉就翻越了张老猫团部的很高的后墙，第二天早上连站岗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进了院的。他多才多艺，会摄影，到包头搞宣传回来，有时带回快速摄影机，给团部摄像。

于科长在沙图沟等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革命印响。

抗日爱国人士穆守政

刘绍仁

萨拉齐县自1937年沦陷后，汉奸、特务到处横行，萨拉齐人深受日寇蹂躏，一些日伪翻译更是为虎作伥，金翻译在萨拉齐县是把坏事做绝人人皆知的一个典型人物。而在萨拉齐宪兵队当翻译的穆守政，在翻译中，可称为身曹心汉的人，是抗日爱国人士。曾在日寇酷刑下也没有供出一同抗日的同志，是威武不能屈的纯粹的一个中国人。

穆守政是东北辽宁省大连市人，原籍为山东，后随父迁大连。因他排行老二，地方上称他为穆老二。据说日本侵略者欺凌中国人的暴行，在他那幼小的心灵就有无比的愤恨，也更体会到了当“亡国奴”不如“丧家狗”的滋味。想寻求抗日的途径。但日寇盘踞大连多年，加之自己年幼，无法投入阵营，为了谋生，给日寇当了翻译，但反日之心未泯。

穆守政初到达萨拉齐县，先在警务科任翻译，后调为日本宪兵队翻译，日本宪兵队在萨县人心目中是一个阎王殿、魔鬼窟。被捕入宪兵队生还的少，他们甚至把杀戮中国人当儿戏，其心之残忍，可见一斑。穆守政目睹日寇的暴行恨之入骨，更激起他爱国抗日的决心。于是留意于地方知识界具有爱国思想、敢于牺牲的人物，联系他们共同抗日，起先他结识了尹生馨，尹是当地大学生，继由尹生馨介绍认识了当时萨拉齐县县立模范小学校长贾登玺，贾登玺性情豪放直爽，也是一位爱国人士。相识后，他们几人无所不谈，遂成为莫

逆之交。有时针对当时形势，分析战局，并认为德国遭到苏联反击，败局已定，日本必败。到那时候，当汉奸的，当翻译的一定要受中国人的惩处。而现在光明的出路只有抗日。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穆派人到黄河南岸伊盟地区和国军联系，联系成功后再争取策反日伪，而主要的是争取萨县伪警察大队的管辖机关警务科的科长范嘉信。

1942年秋，穆派的人经多方周旋终于和国军驻伊盟办事处取得联系（办事处设在东胜）。次年春该处负责人侯镇国亲来萨拉齐与穆守政会晤，密谈了进行抗日的意见，最后决定在没有直接抗日武装力量的情况下，要对日伪武装进行策反，争取警务科长范嘉信，对这一决定，贾登玺有不同看法，他说范嘉信系东北人，受奴化教育很深，不一定可靠，有无爱国之心，要打问号，万一中途变卦，咱们这些人的脑袋就会搬家，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警惕，不能麻痹。而穆守政则是以己之心度人之意，认为自己爱国，别人也会爱国，有谁甘当亡国奴呢？因为出于激情，没有认真考虑范的可靠程度，却满有把握的说：没问题，我是了解他的。

1943年10月的一天下午，尹生馨到萨拉齐县立模范小学找校长贾登玺说：“晚上咱们去老二家”。当晚去穆守政家的有尹生馨，穆守田（穆老三）还有张登海、关子良（驻萨拉齐蒙疆报社记者）、贾登玺，还有一位穿军装的人，就是萨县警务科长范嘉信。此外尚有两个陌生人。经过穆守政介绍，才知他们是从东胜县来的，一名常光义，另一名叫王致公，到场的共九人。

饭菜已经备好，边吃饭边讨论，对怎样组织人员，策反部分武装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特意叮实范嘉信是否敢承担

这一责任，范嘉信一再表示，我是一个中国人，凡是中国人都有爱国之心，有抗日救国之责，尤其是我范某，更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兄弟们怕我反悔，甚而告密，在这点上请大家放心，我姓范的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绝不做小人事，如果大家不相信，我愿对天宣誓。大家见此情景一致认为范没问题了，齐说范科长，算啦，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当晚十时许，人们在穆家密议后陆继回家，只以为万事大吉了，不料日寇在城内进行大搜捕，除范嘉信（告密人）外其余参加密议的八人统统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逮捕时日寇唯恐中国人相互认识，互通情报或串供，事先就做好若干黑布口袋，给被捕人每人头上戴一个，人们称做黑帽子。对这一事件叫黑帽子事件。当日将这批人押送到包头市日本宪兵队。这一次被捕近百人。

在包头宪兵队“留置场”（监狱）里放风时穆守政和常光义有一次照面，穆向常示意不论日本宪兵队如何动刑，绝不能供认别人，只能承认与我有过联系，我也只与你过来往，与其他人一概无关。

日寇为扑灭抗日火焰，在这一案件上大做文章，企图罗列更多的中国人进行杀害，对穆守政使用了各种酷刑妄想让穆供出更多的同案人，在此关头，穆守政挺身而出，用日语直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寰的暴行，受尽肉体摧残，没供出抗日活动的同案人，在审讯中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常光义在包头日本宪兵队“留置场”关押，因穆老二已暗示不能供认与任何中国人密谋抗日，所以他在各种酷刑下，矢口否认与其他中国人策划的抗日事情，这竟激怒了日

本宪兵，日寇当场开枪将常腹部击穿，直到最后临刑时腹部仍未愈合。

驻包头日本宪兵队对穆守政等抗日一案没搞出什么结果，就将穆守政、常光义、尹生馨、贾登玺、张登海、关子良等六人，押送伪蒙疆首府“张家口”日本军部，又经过日本军部复审，案结，将穆守政、常光义二人秘密杀害。

尹生馨、贾登玺两人，各判刑二年，关子良、张登海各判刑一年。

穆守政、常光义为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成为我中华民族的好男儿，爱国志士！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为人民所赞扬，民族败类向日寇告密的范嘉信则永被人民所唾骂。